



英汉语言美的对比

研究

YINGHAN YUYAN MEI DE DUIBI YANJIU

◎张尚信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张尚信 著 野烟 (913) 皇朝藏书并图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长沙

内 容 简 介

该书借助丰富的实例,从音美、形美、意美、文字美、篇章美等角度对英汉语言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且分析了英汉民族的审美观念对英汉两种语言美的干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张尚信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1113-421-6

I. 英... II. 张... III. 汉语—语言学:美学—对比语言学—英语
IV. H1-05 H3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072 号

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

Yinghan Yuyan Mei de Duibi Yanjiu

作 者:张尚信 著

责任编辑:王桂贞

封面设计:张 毅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21691 (发行部), 8821343 (编辑室), 8821006 (出版部)

传 真:0731-8649312 (发行部), 8822264 (总编室)

电子邮箱:wanguia@126.com

网 址:<http://press.hnu.cn>

印 装: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870×960 20开 印张:14.5

字数:270千

版次:2008年8月第1版 印次: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1113-421-6/H·139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一

中国最早的英汉对比研究，从严复的《英文汉诂》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比较是研究语言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刘重德，2002），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语言学界兴起了一股英汉对比研究的热潮。二十多年来，各种刊物、学报上发表的英汉对比论文数以千计，出版的英汉对比研究专著一百多部，英汉语对比研究硕果累累。对比研究的领域也拓展到了方方面面，既涉及语言本体或纯语言的研究，也涉及结合社会、文化、心理、国情等的语言综合研究。

但是，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对英汉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还很少，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然而，这是英汉对比研究值得去开拓的一个新领域。张尚信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2003年，他申报了省级研究课题“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开始对英汉语言美进行对比研究，随之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专著《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是他在上述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的，是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该书以美学为切入点，对英汉两种语言从音美、形美、意美，从语音、字（词）、句子、篇章和英汉民族的审美观念对英汉语言美的干预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视角新颖，开拓了英汉对比研究的新领域。专著中既有丰富的实例分析，又有适当的理论提升，对于整个英汉语对比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希望《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的出版，能对英汉对比研究的深入进行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是为序。

黄振定

2008年5月于湖南师大

序 二

《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的作者张尚信副教授是湖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七七级的学生，和我是师兄弟。作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他渴望知识，勤奋学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成绩优秀，他毕业后被分配到现在的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任教，又与我是同事。现在，我当系主任，他担任系党总支书记，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又是好搭档。

二十多年来，他讲授过多门课程，均深受学生欢迎；主持过省级科研课题，编写过教材，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从2003年开始，他把英汉语言对比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在我国已不是一个新课题，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更是形成了热潮：既有微观的对比研究，也有宏观的对比研究；既有只针对语言本体的纯语言研究，也有结合社会、文化、心理、国情等的语言综合研究等。就语言本体研究而言，已经深入到了区别性特征、音位、音节、词素、词、词组、从句、句子、句群、语篇等各个层次。要再出新的成果，已是不易。

然而，他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写成了《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值得庆贺，我为他高兴。看过他的书稿，我觉得本书很有独到之处。它从美学的角度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了全面比较，而且探讨了英汉民族的审美观念对英汉语言美的干涉。在我国，英汉对比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对英汉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很少，《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视角新颖，开拓了英汉对比研究的新领域，于英汉对比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我相信，它的出

版，必定会受到英汉比较学术界的欢迎，受到读者的青睐，对英汉对比研究深入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是为序。

潘利锋

2008年5月于湖南科技学院

目 次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英汉对比研究的简要回顾 (1)
- 第二节 英汉对比研究的性质、范围与方法 (30)
- 第三节 英汉对比研究的重要性 (34)
- 第四节 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 (36)

第二章 英汉语之音美对比

- 第一节 英汉语音素之音美对比 (41)
- 第二节 英汉语音节之音美对比 (45)
- 第三节 英汉语之音韵美对比 (55)

第三章 英汉语之文字美对比

- 第一节 英语之文字美 (112)
- 第二节 汉语之文字美 (122)

第四章 英汉句子之形美对比

- 第一节 均衡对称——英汉句子之共美 (156)
- 第二节 对偶——汉语句子之独美 (159)
- 第三节 孔雀开屏、雄狮显威——英汉句子形美又一差异
..... (174)

第五章 英汉语之篇章美对比

- 第一节 英汉语之篇章结构对比 (179)

第二节	英汉语之语篇连贯手段对比	(222)
第三节	英语之主语显著与汉语之主题显著	(226)
第四节	英汉语之篇章结构与英汉民族之思维模式	(228)

第六章 英汉语之意美对比

第一节	英语之意美	(231)
第二节	汉语之意美	(240)

第七章 英汉民族的审美观念对英汉语言美的干预

第一节	英汉民族的审美观念对对偶句的不同态度的美学渊源	(254)
第二节	形合、意合与英汉民族的审美习惯	(258)
第三节	英式孔雀型序列与汉式雄狮型序列的美学观照 ...	(260)
第四节	英语的 SVO 句框架与汉语的“流水句”框架的不同审美心理	(261)

附：《美学语言学》梗概	(265)
-------------------	-------

参考文献	(274)
------------	-------

后 记	(278)
-----------	-------

第一章 绪 论

对不同的人或不同的事进行对比是人类社会十分普遍的现象。语言间的对比也是如此。当人们掌握了一种语言后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时,或者同时接触两种语言时,经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们作一些对比。从表面上看,语言对比似乎已是人们十分熟悉、相当了解的事。但事实上,它还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就是这些课题中的一个。

第一节 英汉对比研究的简要回顾

英汉语言美的对比研究是英汉对比研究的一个方面。在对英汉语言美进行对比研究之前,我们先对英汉对比研究的基本状况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英汉对比研究与研究史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中国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说:“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

吕叔湘先生更把比较看作语言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他说:“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语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语法书也是徒然。”(吕叔湘,1942:7)

语言研究中的比较,可以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的,也可以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开展的;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所谓对

比研究是其中的一种,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比较研究,描述它们的异同,尤其是不同之处,以促进人们对所对比语言的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纂等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语言学中的这种比较研究,称作“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简称为 CA),也称作“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已成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他最早提出了语言比较与探索人类精神的关系的思想:“不计其数的民族作为人,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担负着创造语言的任务,而比较语言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详尽地探索这些不同的途径;倘若忽略了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之间的联系,比较语言研究便会丧失所有重大的意义。”(Humboldt, 1836: 21; 中文译文见洪堡特, 1997: 16)

而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却是 20 世纪以来的事,它在欧洲与美国可说有两个源头。在欧洲,关于对比语法的设想是著名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最早提出来的,他在《语法哲学》一书末尾指出:“比较语法和历史语法生气勃勃的巨大影响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请允许我在结束本书之前指出,这本书观察语法事实的方法可能会为比较语法创造一种新方法,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比较语法,这种比较不必局限于属于同一语系、同一起源而通过不同道路发展起来的语言,对差异最大、起源迥然不同的语言也可以加以比较。我在这里所做的可以当作一种意念性比较语法的简单雏形,我希望那些眼界比我开阔、语言知识比我更丰富的人能接过这项工作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以便帮助我们比本书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的思维的最内在的本质。”(叶斯柏森, 1924: 500, 501)

叶斯柏森创立的这种“新的比较语法”就是对比研究。同时,他还具体指出了进行对比的方法:“如果我们采用本书使用的方法,即从 C(意念或内在意义)出发,探讨全人类共有的每一个基本概念在各种语言里是如何表达的,由此通过 B(功能)到 A(形式),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并能在事实上创立一种新的句法学。”(叶斯柏森, 1924: 501)

叶斯柏森主张的是一种多语言的对比。所以,我们在《语法哲学》

一书中可以看到丹麦语、古丹麦语、英语、古英语、法语、古法语、德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挪威语等不下二十种语言的用例。正是通过这种多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许多语法现象与问题在叶斯柏森笔下得到了清晰的展示与阐述。

而美国的对比语言学肇始于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B. L. Whorf）。与叶斯柏森相同，他是把对比研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并且最早提出了“对比语言学”这一名称：“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为了研究世上的物种，开始是描述全球每个角落现存的物种，后来又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加上了化石；接着他们觉得有必要对这些物种进行比较和对比，于是为之分门别类，理清进化过程，研究其形态和类型。语言科学也正在做同样的工作，而且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一个新的语言和思维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距离较远的语言事实。把地球上的语言分成语系，每一语系内的语言都来自同一个祖先，研究他们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的研究叫做‘比较语言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而更重要的是将要产生的新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不同语言在语法、逻辑和对经验的一般分析上的重大区别。”（Whorf, 1941: 24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语教学的需要，语言学家弗里斯在《论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一书中提出了以对比作为教学基础的设想（Fries, 1945: 9）。根据这一构想，拉多于1957年出版了《跨文化语言学》一书，全面讨论了如何对语音、词汇、语法、文字、文化进行对比。现代学者一般以此作为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正式成立的标志，尽管此书并没使用“对比”这一字眼，而其实实际所做的只是出于教学的需要，把比较扩大到了“任何两个语言与文化”之间。（Lado, 1957: vii）

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年轻，但对比的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却有着相当漫长的历史。有的语言学家明确指出：“语言之间的比较源远流长。自有语言研究以来便有语言之间的比较，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与语言研究可以说是同时开始的，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J. Ellis, 1966；转引自许余龙，1992：21）

王宗炎先生也说：“对比分析是古老的，因为自有翻译以来就有语

言对比。”(王宗炎, 1983: 3)

如果说, 在西方语言学研究中, 对比方法先于学科而存在, 那么, 同样的情况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中也存在。早在 1932 年, 赵元任先生就发表了英汉语调对比的论文《英汉语调初探》。1933 年, 林语堂和黎锦熙分别出版了以对比为主要方法的《开明英文文法》和《比较文法》。20 世纪 40 年代, 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通过系统而全面的汉外对比, 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汉语语法体系。可以说, 语言学家们在具体的对比实践方面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对比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事情。1977 年 5 月, 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演讲, 后来整理成文在《语言教学与研究》试刊 1977 年第 2 期上发表。吕先生在文中提出: “要认识汉语的特点, 就要跟非汉语比较, 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吕叔湘, 1977)

吕叔湘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说发表得正是时候。因为其时及以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异军突起, 十余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正急需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理论的支撑, 对比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工具。正是在吕叔湘先生这篇文章的指引之下, 对比语言学在我国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 并且逐渐形成了汉语界、英语界乃至理论语言学界各方面力量的一支合力。三十多年以来, 研究者在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和文化等许多方面的汉外对比、特别是英汉对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并从最初单纯的微观研究逐步扩展到了中观和宏观研究。因此, 说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学科的形成, 是可以为全体研究者接受的。1994 年,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在长沙成立, 出版会刊《英汉语比较研究》, 将英汉对比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随着学科的发展, 学科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因为学科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在总结以往的成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更好地看清学科的意义、价值和发展方向。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老会长、当时八十多岁高龄的学界前辈刘重德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中国英汉对比研究史的框架。他指出: “我国的对比研究可分如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应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的《英文汉诂》算起, 到四十年代末。在这一时期, 赵元任、黎锦熙、

王力、吕叔湘等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尤其是英汉对比研究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可惜对这段历史我们还没有人认真总结。1949~1976年这个时期，中国的对比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第三个时期是从1977年5月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开始的。”（刘重德，1996：v）

刘老的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尽管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形成于1977年，但在回顾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历史，挖掘和总结中国对比语言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资源时，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忽略自19世纪末以来众多语言学家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刘先生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表示了同一观点。

“在国内说到汉英对比研究，恐怕应从马建忠和严复算起，在他们之后有黎锦熙、刘复、王力、吕叔湘等，为了创建汉语语言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他们拿Nesfield, H. Sweet, Jespersen, Bloomfield等人的语言学理论和语法著作跟汉语作了大量的比较，找到了英语和汉语的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写了许多著作。”（杨自俭，1992：45）

“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马氏文通》（1898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1968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等语法名著都是通过汉语和外语的对比研究产生的。”（连淑能，1993）

因此，一部英汉对比研究史，应该从马建忠写起，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第一时期与第三时期相比，毕竟有着很不相同的特点（我们撇开了第二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第一时期的特点是大家林立，巨人辈出，但是他们的如椽之笔主要在于从总体上构建汉语语言学，并没有以对比研究或构建对比语言学作为根本追求。因此他们的对比思想、对比理论，乃至对比实践，往往掩藏在对汉语的具体分析之中，不像第三时期的诸多研究者那样有明确的理论追求和实践目标。因此，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可以把这两个时期分别称为“以对比实践为主的时期”和“有自觉学科意识的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以对比实践为主的时期的对比研究，学者并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

只是感到在汉语语言自身的建设过程中有一种强烈的需要,因而自觉地将汉语与各种外语特别是英语作比较,并关注如何将国外的种种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汉语。正如杨自俭和李瑞华所说:“他们的对比研究虽有移植的问题,但其中包含着认真的鉴别和自己的独特创造,对汉语语言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创了择善化用的传统。”(杨自俭、李瑞华,1990:2)

《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早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在汉语语法史上,《马氏文通》一向以其“模仿”受人诟病,其实正如王力所言:“马氏以后,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搬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王力,1981:178)

马氏的比较研究体现在他的“后序”中:“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建忠,1898:13)

“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在当时也是不得已之事,因为汉语没有现成的语法体系;“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是比较,也是马氏用功最勤、成绩最大之处;“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是目的,建立一个汉语语法体系。由于马建忠以构建体系为目标,因此可以说他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对比。认真发掘他在“求其所同所不同者”的过程中究竟做到了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

20世纪20年代初,黎锦熙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是《马氏文通》之后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它既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又是第一部将现代汉语与英语作对比的著作。

1933年,黎锦熙又出版了一部《比较语法》,这是汉语历史上第一部以“比较”命名的语法著作,作者第一次给“比较文法”下了汉语的定义:“比较文法者,一、以本族语之文法与世界其他族语相比较;二、以本族本支语(如汉语)之文法与同族异支之兄弟姊妹语(如藏、缅、泰、苗等语)相比较;三、以标准国语(如汉语之现代北京语)之文法与各地不同之方言相比较;此皆属于语言文字学(英名 Philology)之范围;四、以汉语中今语之文法与古文相比较,此可作为‘汉语发展变迁史’之一部分,固亦不在语言文字学范围之外,唯在语文教育上颇有偏重应用之意味。”(黎锦熙,1933:19)而且强调:“所谓

比较，重在异而不在同：同则因袭之，用不着一一比较；唯其异，才用得着比较，或大同而小异，或小同而大异，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黎锦熙，1933）

他并且批评《马氏文通》“一手把住拉丁文法而遂挪作中华文法”，是一部“拉丁文法汉证”。但是，《新著国语文法》与《马氏文通》一样，仍不免被批评为“模仿语法”的代表作。这是因为在根本的语言观、语法观上，他同马建忠没有很大的区别。马建忠认为思想乃至语法都是全人类共同的，他说：“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马建忠，1898：12；参见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2002）

而黎锦熙也同样认为：“思想底规律，并不因为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逻辑的分析，也不因语言而别异，所以熟悉了国语底句法，无论学习何种外国语，翻译何种外国文，自然要觉得工作容易些。”（黎锦熙，1924：1）

将上述思想贯彻到他的汉语语法研究中，就会以英语语法为“先存之理”来看待汉语的词类、句子等，并使它们尽可能地和英语语法保持一致。因而尽管马建忠的研究方法是刻意求同，而黎锦熙的研究是有意求异；前者发现了“助字者，华文所独”，后者找到了“句本位”和“位”（相当于半个世纪后开始热闹起来的汉语格语法研究），但从总体来说，《马氏文通》固不能逃脱“模仿”之诟病，《新著国语文法》也只落得“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之自嘲。（今序（1951），见黎锦熙，1924）

在这一时期的语法研究著作中，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年）很值得注意。吕叔湘先生在《重印〈国文法草创〉序》中说：“《国文法草创》是五万字左右的一本小书，但是里面包含许多宝贵的东西。‘以少许胜人多许’的评语，著者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吕叔湘，1982a：3~4）

这本书在对比研究上的贡献是彻底批评了《马氏文通》以来的比

附性做法，提出了以汉语为主的原则。他说：“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有绝异者数点：其一，主形；其二，单节音，且各有平、上、去、入之分；其三，无语尾等诸变化。故其文法发展之径路，与西文异。如‘标语’（作者按：相当于今日所谓‘话题’），如‘说明语’（作者按：即今之所谓‘谓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意动’、‘致动’之作成法，如助字等，皆国文所特有者也。至如关系代名字，如象字比较级之变化，如名字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类，如主语之绝对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国文则非甚必要。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趾适履，一也；比附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歧异，靡所适从，四也；举国文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不能尽其用，五也。是故治国文法者，当认定其所治者为国文，务于国文中求其固有之法则，而后国文法乃有告成之一日。”（陈承泽，1922：11）

可以说，这本著作所显示的卓见预示着中国语法研究将开始向注重汉语语法自身特点的方向发展。

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具备了改革的基本条件。一方面是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语法研究者在肯定它的“首创之功”的基础上，对其研究目的、对象、材料、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对它一味模仿西洋语法，忽视汉语自身的特点，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表示不满。这些批评和不满体现了人们希望摆脱旧的、比附的语法体系，建立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新体系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20世纪初，西方语言学界开始以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传统语法体系，对传统语法进行了一次大检讨，并产生了一批体现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语法著作，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1924年）、房德里耶斯的《语言》（1921年）以及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933年）。

当时，人们对传统语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语法研究忽视各族语自身的特点，将现成的语法范畴套用于各种不同的语言；二是研究时忽略各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用“原子主义”的观点孤立地观察各种语言现象。总的说来，新的思潮就是要求更多

地注意语言自身的特点和系统性。以上这些论著还提出了语言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譬如语言研究应该以口语为主,而不是仅以书面语为凭;语法研究应该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研究可以从形式到意义,也可以从意义到形式;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语法;形态不丰富的语言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等等。所有这一切,对当时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林语堂的《开明英文文法》(1933)就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出现的第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语法书,它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尤其如此。他采用了叶斯柏森的“从内到外”亦即从意义到形式的语法研究思路,是世界上这种写法的语法书的第一次实践,比叶氏本人依此原则写的《英语语法精义》还要早三年,比后来盛行的“交际语法”、“意念语法”、“功能语法”等更要早几乎半个世纪。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写法不仅仅是切入点的变换,而且是语言观、语法观的转向。他接受了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的语言观,认为“语法是表现的科学,一切语法形式和结构只是表达意念的手段”。(序言,见林语堂,1933)

当前,在英汉对比领域,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对比研究有三个层次:其一是结构层次,其二是表达法层次,其三是语言心理层次。林语堂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到达了第二层次,并且已经关注到了语言心理层次,比起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搞对比的人停留在表面的结构层次,这简直是一个奇迹。难怪1982年吕叔湘先生在为重印《开明英文文法》写的序中说:“此书不仅解释了英语在表达相同概念时与汉语有什么不同,还深入指出了说两种语言的人对概念的理解本身就不同,从而引导学生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英语的思维方式。人们早就感到有必要进行英汉语法的比较或对比实用研究,这本书可说是最早最认真的尝试之一。”(吕叔湘,1982b)

这本书中有许多对比研究的成果值得发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人对它进行过认真而全面的研究。

在汉语语法学界,王力1936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初探》一文,对《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以西洋文法来支配中国文法”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王力声明:“我们并不反对从比较文学上悟出中国文法的系统来,我们只像陈氏(作